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6.023

■ 文学研究

中国20世纪初期隐逸文学与佛教的关系^①

高传华, 杨洪丽

(山东体育学院 办公室, 山东 济南 250102)

摘要: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上承古代隐逸文化传统,下接当下文学风尚。它承载了多重的文化意义,为文学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向度和研究可能。隐逸派作为现代文学的典型存在,与佛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研究为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多种可能。

关键词:隐逸;佛学;京派;魏晋风度;性格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6-0126-07

On Chinese Reclusion Literature and the Buddhis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GAO Chuan-hua & YANG Hong-li

(Secretariat Office, Shandong Sports University, Jinan 250102, China)

Abstract: As the unique existenc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Chinese modern reclusion literature inherits ancient reclusive cultural tradition, integrates modern literary styles, bears multiple cultural meanings, and provides a new thinking dimension and research possibility for the literary status. As the typical existence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 reclusion school has a thousand and one links with the Buddhism.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odern reclusion literature has offered many possibilities to enrich the reclusion culture and the reclusion literature.

Key words: reclusion; the Buddhism; the Beijing school; Wei - Jin demeanor; character factors

隐逸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由此形成了丰富的隐逸思想、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中华民族自文明诞生之初,就孕育着出世与入世、消隐与进取的矛盾,彼此消长。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所谓隐逸,就是士阶层中的某些人,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悖离,或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超然出世,回归自然、回归自我的行为和心态。据传上古时期就有巢父、许由这样的隐士,春秋时期,道家、儒家的一些经典为隐逸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魏晋玄学的兴盛使隐逸文化走向成熟。此后尽管各个朝代的隐逸方式、途径不断发生变化,但隐逸文化传统却顺承下来。隐逸文化带给士人们人格的解放和自由的获得,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审美潜力,隐逸文学则彰显了文学的休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本质的回归。

在漫长的文化嬗变中,由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隐逸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

① 收稿日期:2014-05-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750193)

作者简介:高传华(1976-),男,山东邹城人,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讲师,山东省写作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古代,一些隐士或者有心归隐的人借助于自然田园、名山大泽等退隐之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如老庄道家文化、禅宗文化、陶渊明的田园诗歌等。

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现代工业对自然环境的侵蚀越来越严重,河流污染、雾霾天气、食品毒素等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因为人口的大量繁殖,社会关系不断细密化,人际交往和活动范围远比古代时期要复杂、宽泛、难以处理得多。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现代人逐步反省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比如卡夫卡、萨特等。但是从整体上看,作为个体的人又无力对抗社会发展的大势,在日益增高、繁密的高楼大厦和街道车流中,人自身愈显得渺小无助。于是人在越繁华的地方反而越显得孤独,在来来往往的车溪人流中、在鳞次栉比的宾馆大厦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渴望寻找家园的人们于是便把隐逸当作是一种潜在的愿望和梦想,并催生了一些隐逸现象和隐逸行为。近些年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或逃离“北上广”,回归故乡过平淡的生活;或到闹市的郊区开辟属于自己的园地,过“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更有甚者,有的人竟然像古人那样落发为僧或隐身于名山大川。在20世纪初期,苏曼殊、李叔同削发为僧,黄宾虹多次隐于峨眉山、雁荡山等名山。21世纪初直到现在,仅仅在终南山就有数以千计的“隐士”隐身其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很显然,隐逸在现代社会绝不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

一 现代隐逸诞生的背景及意义

和任何朝代的更迭所带来的遗民现象一样,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使古老的中国从古代走向现代,不仅留有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也产生很多隐士或者有隐逸特征的士人。其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机器洋房的产生,沉静安详的田园社会被打破,很多世代守护故土的乡绅士子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尤其是近30年,文明的喧嚣遍及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遥远的天涯变成咫尺之间,连神秘的西藏都通上了高速列车。

所有这些仿佛都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赖以隐居的物质场所,但恰恰相反,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沉重的生存压力反而更引发了人们对于隐逸的渴求和梦想。况且隐逸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集体无意识早已沉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近年来,穿越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穿越类文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占据了畅销书的前几名,这正说明了人们在现实中进退失据的一种无奈的窘境。就像鲁迅在绍兴会馆抄魏碑的那10年,“回到古代去”,其实也是一种隐居。在当代,选择隐居的人们也不在少数。著名的隐居圣地终南山,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和台湾、日本、韩国的隐居者在此隐居修行,他们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一理想。追求隐逸的人群集中在80年以前出生的几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安静祥和的农村,来到文明繁荣而物欲横流的城市,因而内心深处有着回归自然和归根故乡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隐逸的愿望也会越老越强烈,因而说隐逸不仅是一种文化心理,也是一种生活和精神追求。

就隐逸行为来说,隐逸可以避开主流文化的侵蚀而保留自己的精神家园,并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修复。此外,隐逸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它更是许多文人学士渴望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和审美主张,是追求优雅、安静、平和的人文精神的表现,是边缘的、独立的审美境界体验^[1]。在文化导向和文学潮流之外,还是一种人生态度。在中国最早的思想源头上就存在着对于隐逸的追求,陶渊明、孟浩然、林逋等都是杰出代表。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沈从文、汪曾祺、阿城等开创了现代隐逸的传统,并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隐逸文学作品,它们的存在,已经不仅是个体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

从隐逸文化来说,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它上承古代隐逸文化传统,下接当代文学风尚,承载了多重的文化意义^[2]。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和实践者的周氏兄弟,均对隐逸文学极为兴盛的魏晋有着极深的研究,尤其是周作人和其弟子废名、俞平伯,更是现代隐逸文学的开拓者和践行者,甚至是与周作人有极大关系的京派文学,都有着浓厚的隐逸倾向。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及其学生汪曾祺,对中国现代史上的两次隐逸文学的勃兴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他的笔下营造了迷人的湘西世界,还有其他作家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示了对隐逸理想的追求。实际

上,隐逸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的弹性心态和纷繁生活中的调节。

当代中国处在经济繁荣、文化众声喧哗的时代,隐逸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追求,丰富了现代文化传统,对现代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探讨可以更好地了解隐逸文化的精粹。现代隐逸文学的艺术审美则给人们带来了人格的解放和自由的生活状态等精神价值,并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现代隐逸文学成为一个流派和一种文学现象,并影响着当下的文学风尚,它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深度,既有认识论的价值,也有方法论的价值。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关键时期,梳理回味一下传统民族的文化和心理,也许能不无启迪。

二 20 世纪初期的现代隐逸文学

所谓隐逸文学,就是由隐逸文士及有归隐倾向的羨隐文人共同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它既包括隐逸文人本身,也包括了他们与“隐逸”相关的物质性实践与精神性实践。换言之,作家本人的隐逸以及有着隐逸倾向的作品——包括渗透于其中的隐逸理论和隐逸精神,都可归于隐逸文学的范畴^[3]。古代隐逸文学先后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和元明清时期,并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了不同的表现形态。

现代隐逸现象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很多士人由于各种原因选择了隐逸的生活,最为知名的如苏曼殊、李叔同、黄宾虹等。苏曼殊(1884-1918)作为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擅长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创作了《断鸿零雁记》等风靡一时的言情文学,他12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剃度出家,受具足戒,嗣受禅宗衣钵,并于1903年在惠州正式出家为僧。李叔同(1880-1942)即弘一大师,是现代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兴佛教南山律宗;黄宾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山水画家,他一生多次在黄山、华山、雁荡山等名山大川隐居。苏曼殊、李叔同、黄宾虹等近代知识分子延续了中国的隐逸传统,并对当时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

现代隐逸文学则出现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碰撞、对比、汇合的背景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之初,各种主义、思潮、学说蜂拥而入,知识分子共同致力于西洋文明的输入,致力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没有出现明显的文化立场的对峙和交锋。但“五四”文学革命的高潮消退之后,潜隐在文学世界的分歧渐渐凸显出来,文化阵营出现了分化重组,伴随着“五四”的落潮,困倦、彷徨成为时代的普遍精神征候,理想破灭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4]。以鲁迅为代表的左倾知识分子依然坚守文化的激进主义,但以周作为代表的另一批文人逐渐离开了主流文学阵营表现出逃离意识形态的“出世”姿态,在文学上向隐逸文学传统靠拢,给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染上了浓郁的隐逸色彩。作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周作人的这一退隐姿态和退隐而作的大量闲适小品文,引发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流派——“隐逸派”^[2]。

“隐逸派”文学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从周作人20年代初提出“美文”的概念并孜孜于“美文”创作,到《语丝》后期周作人作为“叛徒”的浮躁凌厉之气渐渐消退而作为“绅士”的隐逸之风日渐抬头,许多充满闲适味的小品文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在周作人的影响下,许多作家纷纷开始了冲淡平和之文的创作。“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流派的形成,不是由于作品形式上‘冲淡和平’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那是必然的,在新旧势力对立到尖锐的时候,就是正式的走向肉搏的时候,有一些人,虽也希求光明,但怕看见血腥,不得不退而追寻另一条安全的路。这是周作人与鲁迅思想所以后来分裂了的原因,也是周作人一派的小品文获得生存的基本的道理。”^{[5]79}

“隐逸派”文学的发达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五四”运动落潮后,革命陷入低谷,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许多文人对现实极端失望,他们躲进山林、庙堂以及书斋,用手中的笔追忆着久已失落的传统理想,泼墨于自我的性灵与情调。周作人、林语堂、陶亢德、废名、俞平伯、毕树棠、老舍等创作了一大批平和冲淡、悠然闲适的散文小品,由此出现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闲适小品高

潮^[6]。就这样,“隐逸派”文人以周作人所住的八道湾苦雨斋为中心,以《骆驼草》《宇宙风》《人间世》等杂志为阵地,带着冲淡、闲适的趣味主义姿态和隐逸文化气息开始了他们的散文创作,并不断向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其他体裁渗透。“隐逸派”逐渐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拓的体系,“隐逸派”文学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

现代隐逸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周作人、废名和俞平伯,他们都经历了从青年的积极入世到中年的退隐出世的转变。

周作人是现代隐逸文学的开拓者,他的平淡质朴略带苦味的小品文也成了隐逸文学的某种典范。从周作人散文创作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是从“叛徒”式散文到“隐士”式散文的转变。“五四”退潮后,周作人的叛逆性逐步减灭,而隐逸性与日俱增。大致在30年代中期以后,周作人退居于书斋之中,不问世事,生活视野狭窄;与此同时,语言功力却逐渐炉火纯青,风格古雅遒劲的一类,逐渐形成一种隐逸的文学品格。在他的小品文中,贯穿着一种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和闲适隐逸的生活情趣。讲茶道、行酒令、谈棱角、记鸟声、赋草木、写虫鱼,在琐细物事的记叙中涉古猎今,率性而谈。例如他的《乌蓬船》有着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故乡的野菜》则有着质朴的乡野之趣,《喝茶》更是蕴涵着优雅闲适的士大夫情调。周作人的这种关注生活琐事的选材角度和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对现代小品文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隐逸文学小品文的另一个实践者是俞平伯。作为周作人的弟子兼同事,俞平伯在与周作人长期的交往中受到周作人的直接影响。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立志“闭户读书”,以“苟活于乱世”。他蛰居苦雨斋内,与外界来往极少。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弟子的交往却日益密切。周作人与俞平伯不仅经常见面,而且时有书信沟通;先后共同为《语丝》撰稿,筹办《骆驼草》杂志等。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等先后出版,在俞平伯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空灵和朦胧的意境,这种与众不同的意境带给读者一种远离现实的沉思和感伤,这种风格具有一种闲适的、充满着趣味性和琐碎的美感,丰富了隐逸小品文的表现内容和审美形式。

隐逸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他在思想和文学意识、文学表现上的隐逸性更为强烈和明显,他是真正实行“隐居”的,住在北平时,废名就隐居西郊农家读李义山诗,读老子庄子,渐及佛经,终于“悟道”,抗战时更是隐于故乡黄梅,不问世事。废名的代表性作品是《竹林的故事》《桃园》《桥》等,废名的小说从题材上看是远离现实人生和当时社会问题的,尤其是后来几乎找不到作家对社会的哀愁和抗议,他在小说中描摹了一幅幅静美的中国乡村画,他笔下的人物多是老人、孩子或者天真少女,他们单纯、质朴,少受尘世污染,更具自然本性,在平静的简单宁静中守卫自己的本心和真心,就像《竹林的故事》里的三姑娘一样,处处透露出一种不尚浮华、健康自然的美,正如她所生长的那片竹林一般淑静清纯,使那些习惯了城市美女的那种千娇百媚、锦衣粉泽的人们在隐逸的平淡中感受到别有一番超凡脱俗的诗意美。在安静中弥漫着一种孤独、清冷的氛围,透露出一种孤寂之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然、人生的直觉与感悟,从中可以感受废名叙事框架、意象、文体等独特的生命哲学以及深厚的哲学意蕴。他的这些小说大多可以说是对生命本体的阐释,也是他体验人生的独特方式。虽然废名的这种寄情山水的方式与古代隐士相比大有不同,古代的隐逸,因为与大自然有比较多的亲密接触的机会,其作品中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的飞扬和一种现实飘逸。

废名的小说可以上溯到“古代隐逸之宗”的陶渊明,具有明显的世外桃源的追求。他的小说也都可以当作田园小说来读,他用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为我们构造了一个乌托邦世界,将故事里的山水、树木、村庄、田野、人物都蒙上了一层飘渺、朦胧色彩。他的这种特异风格对后来一些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废名风格中有所汲取而又比较容易被人了解的是沈从文和汪曾祺。沈从文早年在《论冯文炳》中就坦率地承认他写“乡下人”就是“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在何其芳的《画梦录》里也可以看到废名的影子,汪曾祺、阿城对废名的师承同样是明显的。

隐逸文学既不是闲适文学,也不是乡土文学,尽管它们之间互有交叉。隐逸是作家对隐逸生活的追求和隐逸方式的向往,隐逸的核心特征是隐逸者自身与周围环境的隔离,而不是规定在某些场所。它既

可能是像废名那样吃斋念佛、长时期的隐居在乡下,也可能是像周作人那样在古老的北平隐身于他的书房“苦雨斋”里,还有可能是像张爱玲那样隐身于某个不知名的“公寓”里,根本不与人交往交流。隐逸的作品因而也是复杂的。它既可能是闲适的,就像周作人的小品那样;也可能是紧张的,就像《金锁记》的氛围;隐逸的主题既可能是乡村的,比如废名的小说;也可能是都市的,比如俞平伯的散文。总之,现代隐逸行为和隐逸文学也表现出复杂的形态和样式。

三 现代隐逸作家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由于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渊源,现代文学与佛学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许多现代作家、学者都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章太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废名、俞平伯、丰子恺等,尤其是隐逸作家或者有过隐逸经历和隐逸倾向的人为甚,周作人、废名、俞平伯、许地山等可为代表。中国现代作家趋佛的整体原因是佛教能慰藉他们的时代痛苦和人生痛苦,激励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并为他们提供道德理想和艺术借鉴^[7]。佛教不但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信念、生活方式、社会实践,而且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心态、审美追求和文学创作。

周作人作为现代隐逸文学的开拓者,经历了“五四”、大革命、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在不同的事件中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其一生不断在叛徒与隐士的双重身份中冲突沉浮。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和传统士大夫的代表,周作人的叛徒定位与其受到的西方科学和人文教育不无关系,也是儒家积极出世的道德操守的熏陶结果。其后来逐渐沉溺于隐士生活,一方面与他的安静内向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

周作人一生颇与佛教有缘,这既是因为他命运的复杂与多舛造成了他倾向于宗教,另一方面,他的性格也适于佛教的沉静。同时佛教也对他的性格、人生和文学带来深刻的影响。

据说周作人的出生就带有佛教的传奇性。在钱理群《周作人传》中这样描述周作人的出生,“然而,伴随这婴儿降世的,却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于是,一个流言悄悄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什么时候‘白须老人’变成了‘老和尚’,那就谁也弄不清楚,谁也不想去弄清楚了。”^{[8]1-2}

周作人在童年、少年时代也受家人和浙东乡村环境的影响接受了以生命轮回、因果报应为主体的佛教世道轮回观念。他的母亲鲁瑞是一个相信轮回的佛教徒,再加上他出生时“老和尚”转世的传言在他心中留下了较深的烙印。1934年他在《自寿诗》中首联就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的自我描述。周作人求学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时,系统阅读大乘佛教的经注。1921年他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养病期间,其兄鲁迅多次为他购置佛经,这在周作人的日记中都有详载,在20年代他不断整理佛经,披阅律藏和禅宗语录。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六朝散文”时,发现六朝散文与佛教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亲切之感,于是又增设了“佛典文学”课。在其晚年写的一篇长文《我的杂学》里,总结他一生的学识时,就提到“佛典文学”对他的影响。长期的佛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启发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形成了轮回的生命观、历史观、文化观,并影响到他散文小品的风格。周作人在文化观方面也受到佛教观念的影响,如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他把新文化运动解释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种轮回,是“王纲解纽”的又一轮回,和“言志派”的再次得势。他说:“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就是公安派复兴。”从周作人性格和浙东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作家的这种变化有着一定的佛教色彩的宿命性。佛教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渗透进他的生命体验之中,对他的人生理念、心理情感以及生活方式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周作人最亲近的弟子,废名一生在许多方面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废名一生与佛教文化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他不但自己信佛,而且还撰写了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废名这样和佛教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废名沉浸佛学很深的证明。

废名和佛教文化的渊源,首先要提到废名家乡的佛教文化传统。废名1901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城,黄梅县自隋唐以降便成为佛教胜地,有四祖寺、五祖寺,有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故事在黄梅家喻户晓,其中五祖弘忍大师本人就是当地人。弘忍大师在这里弘扬佛法,规模宏大,六祖慧能大师在黄梅得到五祖传授衣钵。中国禅宗正是在这里通过这些大师们的付法传衣而最终走向成熟。直至今今天县城附近这些佛教圣地仍然香火不绝。废名小时候经常到五祖寺去玩,抗战时期废名有一段时间就居住在黄梅县的五祖寺,可见废名与佛教的因缘之深。废名的文学观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废名说:“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儿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9]323}他的小说深受陶渊明桃花源的启示,笼罩了一种佛家出世的色彩。

俞平伯的出生与周作人相似,据说他出生时,祖母也是梦见一个僧人来到她们家,俞平伯的曾祖父,晚清学者俞樾大为欢喜,将这个婴儿乳名取为“僧宝”。俞平伯四岁时,俞樾就决定让他开卷读书,同时送进苏州塔倪巷宝积寺做个挂名小僧人,以求菩萨保佑,长命富贵。这也是江南的民间习俗。但因此在幼年时而往寺院游玩和观赏宗教仪式,从此与佛教结下了因缘。

1932年9月,俞平伯在《戒坛琐记》回忆说:“对于菩萨、天王有一种亲切兼敬畏之感,甚至于眼里梦里都被这些偶像所缠扰,至今未已,这个童年的印象,留下一种对于寺庙的期待。”20世纪70年代,在与叶圣陶信谈及童年与佛时,又说:“对寺院、佛像之爱好固有此童年有关,可能也还有别的因缘。”别的因缘是什么呢?俞平伯没有细说,可能就是一小说,二佛经。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因苏州地区混乱,俞平伯随家迁居上海,开始接触除在私塾所读外的其它闲书。其中夹杂有宗教神话的章回。他后来说:“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三国》《荡寇志》之类,《红楼梦》算不得什么的。但影响更多也更大的是佛经。”

20世纪初,俞平伯在北京就研究《红楼梦》,也讲述古典诗词,其实他也用心于佛经,用佛经说《红楼梦》的“色”和“空”,所谓有说“昔人云《法华经》是譬喻因缘,《红楼梦》亦然也”。俞平伯因于佛学研究有造诣,在他于燕京大学时,就在北京地区宗教界颇有知名度。他在那个时期写的诗歌散文,所用佛家语言,随手捡来,浑然天成,足见他的佛学之深。三四十年代,俞平伯虽是大学国文系教授,但与佛教界人士多有往来,经常参加北平居士林活动。俞平伯晚年仍对佛经颇有兴趣,在七十、八十年代十几年间,常与叶圣陶信件往来,有时几天一封,有时一天几封,其中有几段时间,双方还就佛经和佛经若干问题讨论,抒发自己的佛学认识理念。他们谈得很多的有禅宗和其它佛教各宗。

俞平伯的散文创作和文学研究都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他兼具旧学和新学之长,所做散文颇具六朝散文和明末小品的风格,同时也深蕴佛学的哲理。例如他的《佛典叙录》就涉及到很多佛教典籍,其中的《独语》系列,显然都是他对佛教义理的感悟。作为著名的红学专家、新红学研究的创建者之一,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也渗透了佛教的“色”“空”观。因而俞平伯的诗文创作和文论研究具有一定的趋向性和恒定性,在创作中广泛涉及了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等方面的佛教哲学。

佛教对作家的影响,不仅是限于生活方面的,它更关乎到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对文学的看法以及作家的文学创作。那么,为什么隐逸作家更倾向于像佛教等宗教呢,可能与作家的家庭出身、性格特征、自身经历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出身于小康家庭和书香世家的知识分子更加容易关注个人自身命运的成长,更关注于对知识本身的兴趣,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个人主义追求,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们更容易走上个人隐逸之路,或者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譬如周作人、废名、俞平伯等都是如此。而出生于富商和宦官世家的读书人较多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影响人物命运的社会环境(而隐逸作家更感兴趣的是自然环境),更注重知识的经世致用性,在社会变革或者转折期,他们往往会成为革命的先驱或者成为社会活动家,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则是茅盾、郭沫若、巴金、胡适等。因而“阶级论”就整体而言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人的价值追求都是建立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之上的。

就现代作家而言,辛亥革命后,西方多种文化思潮传入我国交汇撞激,打破了中国几千年自有的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这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精神视野,另一方面也使许多觉醒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所适

从的焦虑和恐慌。读书人不能像工人、农民和商人那样更关注物质实利的需求,他们总在寻求内心信仰的归宿感。在信仰缺失、价值真空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往往倾向于选择隐逸和自我封闭。而在隐逸和自我封闭的氛围内更容易从宗教里寻求解脱。相比较而言,儒家太积极入世,道家又太飘渺虚无,佛教则适中得多。而且隐逸作家自身的家庭背景、性格特点和人生经历也与佛教比较有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们属于易感染人群,更加容易沉入到宗教中去。

周作人出生于没落的小康之家,这一点我们从鲁迅那里已经熟知。鲁迅、周作人虽然出身相同,但兄弟两人性格差异很大。鲁迅因为是长子,在幼年丧父之后,按中国“长兄如父”的传统,鲁迅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所以他性格的积极成分要高出其弟许多。而周作人性格内向,也没有鲁迅作为长子的强烈的责任感,事实也证明周作人的懦弱和自利对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周作人固然因为倡导个人本位而成为影响深远的理论家,但同时也导致了其后半生的悲剧。1926年兄弟失和,既是周作人惧内的结果,也是他不顾家庭大局、不顾兄弟情谊的表现。他既与兄弟失和,又对妻子羽太信子苟且忍让,只好在苦雨斋的一隅书角做隐士。可以说,周作人的隐逸是一种自嘲的无奈之举。与废名、俞平伯的性格内向、恬淡,主动走向隐逸有着很大的不同。

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家境殷实,但自幼多病。他走向佛教,固然与黄梅县的浓厚的禅佛传统有密切关系,也与受周作人的影响有关,更与他自幼内向、不喜与人交往的性格相关联。另外,周作人、废名、俞平伯都是以从教为职业,这种学院环境也为他们寄托禅佛、静心隐逸提供了客观条件。

参考文献:

- [1] 许海丽,宋益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J].山东社会科学,2012(8):51-55.
- [2] 许海丽.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初论[D].聊城:聊城大学,2006.
- [3] 许海丽.试论古代隐逸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综合),2012(3):115-117.
- [4] 席建彬.隐逸:五四文学的一种转向[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综合),2003(2):107-109.
- [5] 阿英.俞平伯小品序[C]//无花的蔷薇——现代十六家小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 [6] 许海丽.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体系初建[J].语文学刊,2009(1):113-115.
- [7] 杨昌江.中国现代作家趋佛的原因及其价值取向[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综合),2009(2):1-2.
- [8] 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
- [9] 废名.中国文章[C]//冯文炳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责任校对 朱正余)